

工业化与乡村集市社会空间萎缩

——以胶东 P 市为例

徐京波

(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集市不仅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消费空间,也是满足农民社会交往、宗教信仰、休闲娱乐、社区认同等公共生活的社会空间。基于胶东 P 市的个案研究表明:伴随着乡村工业化进程,集市社会空间日益萎缩。工业化使得农民闲暇时间不断压缩与碎片化,农民参与集市的非经济活动减少;集市社会交往功能弱化并向工厂迁移;庙会社会功能式微而经济功能凸显,庙会逐渐呈现出“单一商品交易场所”和“旅游产业一部分”的工具性趋向;集市社区边界模糊和社群消解,以集市为中心的村际间的婚姻圈、祭祀圈和公共议事圈受到冲击,进而导致集市社区消解。

关键词: 工业化;乡村集市;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6)03-0043-05

Industrialization and shrinking in the social space of rural market:

Taken P city in Jiaodong region as an example

XU Jingb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market is not only the consumer market for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but also the social space which meets the farmer's social interaction, religion belief,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ty identity. The case study based on P city in Jiaodong region shows that the market's function as social space is shrinking with the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Since that the farmers' leisure time is compressed and fragmentize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non-economic activity hold at market is les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function of rural markets is weakening and shifting to factorie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emple fair declines and its economic function highlights, and the temple fairs tend to be "single goods exchange" or "par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fuzzy boundary of open air markets causes the marriage circle, sacrifice circle and the public circle of discussion to be attacked, which leads to the fade of the marketing community.

Keywords: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market; social space

传统乡村集市更多是依靠血缘、地缘等乡村社会关系来组织、协调和建构的。它是建立在乡土场域中人们相互熟知的交互模式,即约定俗称规则的基础之上,是人们在一种特定关系及社会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空间实践^[1]。伴随着乡村工业化进程和农业专业化发展,自足性生产模式逐渐解体,农民闲暇时间被压缩,而且呈现出碎片化趋势。越来

越多的农民为了获得更多财富,只顾忙于在工厂打工和从事农业专业化生产,参与集市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目的也越来越单一,就是为了消费或交易。传统集市中不参与任何意义上经济行为的农民也越来越少。在农村,目的理性行动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体类型。作为其结果,乡村社会也体现出理性化和世俗化特征。可以说,传统集市中的经济属性开始从乡村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逐渐强化。一方面促进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和生活逐步分离,生产更多地面向市场,生活更多的

收稿日期: 2016-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27)

作者简介: 徐京波(1983—),男,山东平度人,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治理研究。

依赖市场。另一方面,导致了乡村集市社会空间的萎缩,封闭乡土社会下的基层市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开始减弱,社区的边界趋于模糊甚至瓦解。

胶东P市属于县级市,隶属于青岛,位于胶东半岛地区,是衔接青岛、潍坊、烟台三大城市的枢纽。由于P市位于东部沿海,率先进行了改革开放,乡村工业较为发达,主要以石材加工企业为主,大量农民离开原有土地,进入村庄周围工厂从事工业生产,呈现出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这也导致了自足性生产模式的解体和农民闲暇时间的压缩。笔者拟以胶东P市为田野调查地点,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搜集到的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对工业化造成的乡村集市社会空间萎缩效应进行分析。

一、农民闲暇时间的压缩与碎片化

传统乡村集市中的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宗教信仰和公共议事等社会活动一般都发生在农民的闲暇时间。北方传统乡村社会的闲暇时间比较长,一般从秋收结束后至春耕之前有将近四五个月。现在随着农民的非农化,更多的农闲时间被利用转化为工作时间。在P市N镇J村参与式观察时发现:

寒冬腊月,村子里的人们仍然一派忙碌的景象。早晨7、8点钟本地务工人员就陆陆续续地到周边工厂上班。8点半左右村后草莓大棚基地里的农民也开始揭开塑料膜上面的草帘子,开始一天的工作。(根据参与式观察资料整理而成)

以前咱这进了腊月门就有年味了,但现在大伙都在忙着挣钱。年轻人在厂子里打工,也没什么假期,过了初六年基本上就结束了,大家都得去上班。去年俺家大女婿,由于单子催的紧正月初三就去上班。以前正月走亲戚要到十五,现在只能挑重要的亲戚走走,远房亲戚也就送点年货,还没时间吃饭。(访谈资料:20130125—WSY^①)

除了农民闲暇时间减少外,闲暇时间也不再像过去那么集中。这一变化对庙会活动的冲击很大,因为庙会活动是一个准备策划、彩排和演出的持续性过程,需要大量相对集中的时间。过去传统农业的工作时间是具有弹性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农民可以自由支配,不会影响收益,因为农业收益的周期较长,从种到收再到卖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现在作为工厂工人,工作一天挣一天工资,无论什么原因请假当天都不会有工资。如果工厂任

务重、时间紧,旷工甚至会有被开除的危险。简言之,进厂打工农民的闲暇时间不再受自己自由支配,只能接受一种被动的制度安排。

俺一个月平均一般请6、7天假,请假不是回家休息,更多是因为家里有事迫不得已才请假。因为家里有老婆和父母种着地,有些重活他们干不了,有时俺得请假回家帮忙;家里有时老人、孩子生病,看病需要请假;还有就是家族或亲戚家里的红白喜事,也得回家帮忙。所以,回家也不是闲着,需要处理家里的事情,毕竟在厂子里打工的人都是村里的壮劳力,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每天下班后到睡觉前是比较放松的,由于上了一天班比较累,而且晚上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很少出门,基本上就在家看看电视,和家里人聊聊天,哄哄孩子。(访谈资料:20120904—XWB)

闲暇时间的碎片化和缺乏弹性使农民更多的闲暇时间局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农民之间的串门、邻里间的互助、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处理在逐渐减少。这使得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了与其他村民的沟通和交流,更多局限在自己家庭内活动,从而助长了自私的观念,削弱了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其他社区成员的关心。村民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减弱,村民之间的共识和理解难以获得,甚至出现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2]。

二、集市社会交往功能弱化与转移

传统乡村集市是村民跨出村界交往的重要形式,主要体现在赶集路上的交往、集市上的交往和茶馆里的闲聊。现在这三种交往路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交通条件的改善,使更多的人不再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赶集,而是选择现代化的汽车、电动车、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赶集路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传统集市上的参与主体主要分为“为买而卖”、“为卖而卖”、“边逛变买”、“只逛不买”、“为买而买”五种类型。而当今赶集主要是“为卖而卖”和“为买而买”,集上随便走走、转转、看看热闹的人减少了,赶集的目的性增强,就是为了买东西而赶集,集市参与的时间也在减少,集市被视为一个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另外,传统集市上露天的茶铺和小酒馆也不复存在,要么升级为茶馆和酒店,要么直接消失。这也使得农村失去了一个信息传播和公共

议事的空间。

N 镇政府所在地的集市上,有酒楼 8 家,茶楼 3 家。这些场所不再是大众消费的地方,而是人为设置了消费门槛。现代化的装潢、较高的消费标准将当地的普通民众挡在门外。在调查期间,约了两个厂子里的中层管理者访谈,地点选择在一家茶楼。这里不再具有传统茶铺的那种热闹,整个茶楼被分割成许多包间。老板介绍,这里更多是企业老板、管理者谈生意的地方,交谈的也不是大众话题而是私人话题。茶楼的最低消费也要 70 块钱。原先集市上的露天羊汤铺子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酒楼仅仅是请客吃饭、私人聚会的地方。(根据参与式观察整理获得)

集市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并不说明今天的农民没有社会交往,而是社会交往的场所发生了变化,主要以工厂为中心。因为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接触最多的也是自己的工友,由于工友来自不同的村子,甚至有些务工人员来自本地之外,可以说这种交往也是一种跨村社会交往,甚至是一种跨地区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是在生产协作过程中实现的,虽然不一定每一个成员对于群体中所有成员都熟悉,但是密集的协作网络使绝大部分群体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的经济活动与密集的协作网络关系在群体内形成便利的信息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知识、信息、生活方式等等^[3]。

俺们那个厂子一共 70 多人,一共分 3 个车间,一个车间 20 多人。每个车间就是一条独立的生产线,从往车间运石料,石头切割、着色、再到修边、氧化,最终成品。20 多个人有不同的分工,车间主任负责任务分配和生产监督,车间主任下面按照不同的流程分 5 个小组长,每个小组长管理 4 到 5 名工人。其实,全厂子里的人并不都认识,只有自己车间里的人还比较熟悉,大家在工作之余聊聊天、开开心玩笑,特别要好的几个工友有时下班后会去小馆子吃饭喝酒。下班回家后,大家来往的机会不多,更多是在工作时间或上班前后的一段时间。(访谈资料 20130829-FGP)

同样属于跨出村界的交往,工厂里社会交往的范围要远远小于传统集市社会交往,而且社会交往关系的密度也要低于传统集市交往。首先,集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对参与者没有限制,而工厂则是

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只在该工厂务工的员工开放。其次,工厂属于一个法人团体,是按照科层制建立起来的组织。工厂车间的划分是为了便于管理,但是却成为工人较大范围交往的障碍。另外,在不同的车间内部也有车间主任、工组长等职阶系统,他们有明确的职责和权限,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4],限制了工人在工作车间内的深层交往。再次,传统乡村集市的参与群体比较稳定,而工厂里的工人则有较强流动性。有的甚至一年内在多个工厂工作,不利于社会交往深入进行。总之,乡村工业化使村民交往基础由血缘、地缘占主导地位变为业缘占主导地位,交往方式随之发生变迁^{[5][38]}。农民跨村交往实现了从集市向工厂的转移,无论从交往范围还是从交往密度两方面看,农村社会交往功能都在弱化。

三、庙会社会功能式微而经济功能凸显

传统庙会是人们从事宗教、娱乐及其他与交换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P 市改革开放较早,市场因素已经逐渐深入乡村市场。地方政府对乡村庙会更多是采用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利用庙会的文化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试图改造庙会,限制和去除庙会的民间信仰活动^[6]。庙会的社会功能逐渐萎缩,有的甚至变成了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这一变化使乡村庙会的经济功能凸显,使乡村的意识形态从以情感为基础向以利益为基础转变。

H 庙会是在农历六月十五,会期只有一天,而过去是三天。现在到了下午,庙会上就没什么人了,卖东西的撤摊,村里的人回家宴请亲朋吃饭。农历六月十五这天进入村子没有看到任何宗教性建筑和宗教性活动,也没有唱戏、娱神等娱乐活动。从表面上看,与普通的集市没什么区别。主要有两条街组成,一条是东西走向的,这是主街,主要卖吃的、玩的和家里用的;另一条是南北走向的,是辅街,主要卖衣服、鞋子、帽子等服装类。可以说,在整个庙会上吃的商品占了一大部分,这是因为庙会期间宴请亲朋好友的习俗还予以保留。但是宴请亲戚朋友的范围和数量在减少,以前的宴请范围包括近亲、表亲、远亲,现在只保留近亲和要好的朋友。H 村老王家以前逢庙会得宴请亲戚朋友三桌,现在一桌就够了,主要是出嫁的两个闺女、女婿和外孙、外孙女,其他远房亲戚已经不再邀请。(根

据参与式观察资料整理获得)

庙会功能的变化源于庙会地理空间形态的变化,目前,P市大部分庙会所在的村落,宗教性建筑、场所要么被废弃,要么改为他用。没有庙会所依赖的宗教空间,宗教活动及其相关的文化活动难以进行。而且,庙会活动中的民间信仰,很容易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因而面临极大的合法性危机,与庙会相关的公共性活动不再有资源支撑,庙会的公共性也随之丧失^[7]。以前,H村庙会还有一座较大的庙,“文革”期间已经被拆除,过去有祭祀活动和许多民间艺术表演。现在赶庙会一点都感觉不到庙会的特色和氛围,商品贸易成为庙会主角。尽管当前庙会仍然保留着宴请的功能,但是宴请的关系网络在缩小,这是因为许多亲戚朋友忙于打工挣钱,亲属间的关系日渐淡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庙会周边村子的村民参与庙会的积极性减弱,因为庙会缺乏更多人群共同参与的项目。即使周边村子有村民参加庙会,也是更多将其视为一个购买日常用品的消费场所。

在市场因素的冲击下,庙会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如D镇的山神节,原本每年的山会都会有一定的祭祀活动,祈求山神保一方平安。由于山神节的传说来自于该村的一位石匠,D镇为引导节庆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结合当地石材资源丰富,因势利导,将山神节演化为石头节。现在的山神节不再是敬神、畏神,更多属于石材加工企业,这一天所有石材加工企业中午都要放假,请员工在饭店吃饭,给员工发一些福利,晚上燃放大量烟花。另外,在石材行业对外宣传的时候,也会将过去的山神节(现在的石头节)作为一个主要宣传点,增加品牌效应。财神节也出现类似的演变。D镇为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提高该镇葡萄产业的知名度,将传统的财神节演化为葡萄节,将日期从农历7月22日改为阳历的9月1日。

目前,P市农村庙会所在的村子,大部分庙宇已不复存在。虽然也有部分较大庙会在恢复或修复原有庙宇,但更多地将其视为文化旅游产业综合开发利用的一部分。以D镇庙会所依托的两座寺庙的恢复为例。现在D镇为了开发旅游产业,这两座毁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座寺庙开始重建,参观游览的更多是外地游客。尽管也有一些简单的祭拜活动,更多属于游客个人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因为有门票限制,当地人参与较少,虽然寺庙

的建筑得以恢复,但是庙会的相关活动没有得到继承。总之,当今的农村庙会已经走向了两种工具性趋向,一部分演变为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一部分成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这两种取向,使得庙会的社会功能弱化,经济功能凸显。

四、集市社区边界模糊和社群消解

以集市为中心的婚姻圈、以庙会为载体的祭祀圈和集市上跨村的公共议事是传统乡村社会基层市场社区形成的基础。因为它们在实现跨村交往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同的认同和归属,由此形成了边界清晰的群体。但是乡村工业化使得乡村社会日益分化及开放,开始突破基层市场社区的封闭性,导致社区认同及边界逐渐模糊甚至瓦解^[8]。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基层市场社区形成的基础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

首先,婚姻圈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无论是媒人和亲属介绍,还是自由恋爱,在谈婚论嫁时都需要媒人。可以说,媒人在传统乡村社会的通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媒人的主要活动地点则是集市,她们掌握的婚姻信息资源也主要限制在定期集市辐射的各个村落。因此,集市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婚姻圈的中心。但是,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使人口突破了原有区域界线,更多的区域外人口流入本地,实现了跨镇、县、市,甚至跨省流动。这一流动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扩展,基层市场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工厂为农民扩大自己的交流圈提供了重要契机,增加了与社区之外的人的交流的可能,为异地间的恋爱提供了基础。在通过跨地区恋爱实现的通婚模式中,媒人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婚姻当事人的自身社交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社交圈是以工厂为中心,以业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调查中,通过对家庭三代婚姻圈的比较,可以发现辈分越低,婚姻圈的外延越大。特别是80后、90后的当地青年农民,越来越多地通过工厂这一中心,在业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婚姻关系。当前婚姻圈的中心逐渐趋于工厂,但是婚姻圈的边界难以界定,这主要取决于不同工厂员工的地域结构。总之,乡村工业化的强大拉力使得区域流动的刚性壁垒减弱,加速了不同区域青年男女的相互接触和沟通,为婚姻圈的变化创造了条件^[9]。

其次,以庙会为载体的祭祀圈是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10]4-7},当下

供奉神的庙宇、对神的信仰和祭祀活动这三个祭祀圈的构成要素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已经不复存在。P 市农村的庙宇在文革期间基本上被毁坏,庙里的神像也不复存在,使得祭祀活动失去了地理空间基础。许多民间信仰也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地方政府对其保持高度警惕,试图改造、限制和去除庙会上的民间信仰活动。调查发现,当今 P 市农村不仅不存在跨村的民间祭祀活动,村落社区层面上的祭祀活动也不复存在。只有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女性农民将祭祀活动限制在家庭范围内,更多是在逢年过节用贡品祭拜一下祖先,没有传统的祭祀仪式。祭祀活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乡村工业化使得农民的闲暇时间压缩,没有大量集中的时间参与祭祀活动。即使在一些庙会中恢复了祭祀活动,当地农民的参与度也较低,更多是庙会所在景区的专业表演人员展示给外来游客欣赏的,是旅游产业的一部分,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最后,传统乡村社会的跨村公共议事往往发生在集市的茶铺和小酒馆里,讨论的主题往往是涉及各村利益的水利和社会治安问题。但是当今跨村间公共议事发生的地理空间出现了变化,茶铺和小酒馆要么升级为茶馆和酒店,要么直接消失。升级后的茶馆和酒楼不再是大众消费的地方,而是人为设置了消费门槛,讨论的话题不再是大众话题,而是私人话题。另外,原有的村际间的公共事务不再由自发形成的村庄联合体解决,而主要是由政府和市场承担。水资源的分配问题更多是由乡镇一级政府主导决策,与水资源分配相关的水利设施建设也不再由涉及的各村庄自发组织劳动力完成,而是由政府财政拨款,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承包给工程队。社会治安问题也不再是过去的村落联防,更多是由乡级政府所属的派出所负责管理。市场和政府力量的介入与干预,使得各村的村民在跨村的公共事务解决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他们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和市场提供的关于公共事务的服务。因此,这也减弱了农民对跨村间公共事务的关注,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私人事务或家庭事务中,这也无形中削弱了村际之间的联系。作为村民代表的“村委会”在跨村联合中作用也不是很突出,他们更多地是向上对乡镇政府负责,向下对村庄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负责,不同村庄“村委会”间的横向联系也较弱。

综上所述,乡村工业化使更多的闲暇时间得以利用并转化为工作时间,闲暇时间的结构呈现出碎

片化趋势。集市社会交往功能日益向工厂转移,这一交往是在生产协作过程中实现的,由于工厂规章制度的阻隔和工人的流动性,其交往范围和交往密度要远远小于传统集市社会交往。庙会则由于空间物质形态的消失、民间信仰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综合性社会功能逐渐退让,甚至变成了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其开发利用主要是为了服务当地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发展。随着集市社会功能的弱化,村际间的社会关联逐渐减少,基层市场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逐渐降低,导致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消解。原有的村际间的公共事务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承担,不再由自发形成的村庄联合体解决。而政府和市场作为乡村社会之外的力量,主要进行物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有形的公共物品,对村庄发生的消极、隔膜和冲突等隐形公共问题缺乏主动性的洞察。这不仅会削弱村际间的联系,还会导致村际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甚至会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

注释:

① 数字是访谈时间,字母是被访者姓名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下同。

参考文献:

- [1] 陆益龙. 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J]. 江海学刊, 2012(3): 113-121.
- [2] 徐京波. 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105-110.
- [3] 刘玉照. 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J]. 社会科学战线, 2002(5): 193-205.
- [4] 李培林. 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J]. 社会学研究, 1995(1): 20-29.
- [5] 刘娜. 私营企业发展与村落生活方式变迁——一项以山东康庄为个案的实证研究[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07.
- [6] 华智亚. 地方政府与乡村庙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J]. 民俗研究, 2012(5): 139-145.
- [7] 徐京波. 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以胶东 P 市为例[J]. 民俗研究, 2013(6): 142-149.
- [8] 项继权. 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创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3): 2-9.
- [9] 何生海, 王晓磊. 论西部农村婚姻圈的广延性与内卷化——基于西部 G 村为考察对象[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30-34.
- [10] 林美容. 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曾凡盛